

## 日本唐五代汉藏对音译音研究

李 无 未

日本学者唐五代汉藏对音译音研究,高田时雄《敦煌资料による中国语史の研究》(简称《语史》,创文社,1988)有所提及,有:羽田亨《汉番对音千字文の断简》(《东洋学报》13:3,1923);宫本正尊《敦煌出土大乘中宗见解及びその研究》(《宗教研究》新6:4,1929);财津爱象《敦煌出土汉藏对音の材料与〈韵镜〉との比较》(其一,《东洋学丛编》1,1934。もと《怀德》10,1932);金山正好《大乘中宗见解とその汉藏对音》(《大正大学学报》30/31,1940);大岛正二《敦煌出土藏语语汇资料について——唐代西北方言口语音の特徴のいくつか》(《早稻田大学语学教育研究所纪要》6,1968);金子良太《敦煌出土未解明文书一、二について》(《豊山学报》17/18,1973);佐藤长《唐蕃会盟碑の研究》(京都东洋史研究会《古代チベット史研究》下巻の附录第二,1959);高田时雄《チベット文字转写阿弥陀经の奥书——汉藏对音资料の年代についての考え》(《小樽商科大学人文研究》65,1981);《チベット文字で书かれた寒食诗の断片》(《均社论丛》10,66-86页,1983);西冈祖秀《チベット译〈佛说天地八阳神呪经〉の敦煌写本》(《印度学佛教学研究》30:1,1981);汤山明《妙法莲华经の藏字音写による敦煌出土写本断简二点觉书》(云井昭善博士古稀記念《佛教と异文化》,法藏馆,1985);吉田豊《汉译マニ教文献における汉字音写された中世イラン语について》(上,《外国学研究》12,1987)。

这其中,羽田亨对《汉番对音千字文断简》的释读具有重要意义。较早注意敦煌藏汉对音资料,并对汉藏对音进行转写,还确定《千字文》对音性质及与研究唐代西北方音的关系。

罗常培认为财津爱象研究存在4点不足:一是没有用《大乘中宗见解》材料。二是与《韵镜》比较,只比较声母,未涉及韵母。三是羽田亨和托马斯(Thomas)藏语音文字转写方式不同,财津爱象不但不能认识,还不能将两者统一起来使用。其四、藏语音文字转写错误很多。高田时雄则补充说,他仅列了比较表,没有提出结论。金山正好(1940)虽然用了《大乘中宗见解》材料,但缺欠明显。高田时雄未提到的论著也有。山本达郎《Drug-gu (Dru-gu, Drug) に就いて》(《东洋学报》26卷1号,1938)和饭田利行《日本に残存せる中国近世音の研究》(驹泽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室,1955)、吉田雅子《敦煌写本〈开蒙要训〉音韵体系——押韵、异文、音注をととして》(《东洋大学大学院纪要》23号,1987)、冈本勲《注音本〈开蒙要训〉と日本汉字音——清浊のゆれをめぐって》(《训点语と训点资料》78号,1987)等。

高田时雄《语史》有音韵与语法两大部分。音韵部分结论与罗常培存在着不小的差别,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系统主要是:声母:计6组29类。韵母:有23摄55韵。声调:根据《开蒙要训》音注,确认次浊上声与去声合流,即所谓“浊上归去”。《语史》归纳的河西方言的声母是5组26个。韵母:15摄79韵。声调:全浊上声和浊去声合流的同时,清上和清去也合流,调值较低。

《语史》使用材料和性质。第一类：汉藏对音资料。第二类：有コ-タン文字转写资料。第三类，《开蒙要训》、《诸杂难字》、《难字音注》、《佛书音注》等音注资料。超过了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所依据材料范围，考订也非常精审。

前两类资料显示了单一的河西方言时代变化状态。虽对百年之差说明有一定难度，但比如声母彻底清化，微母完全脱离鼻音化，韵母三等重组二类区别消失等等，完全发生于这一时期。第二类资料显示的这些特征作为河西方言的特征不仅是十世纪，就是追溯到八、九世纪即已存在，并接近事实。在八、九世纪时候，进步的“河西音”和保守的“标准音”并存。

《语史》强调，罗常培把唐五代西北方音系统与6种现代方言看作有直接继承关系。但问题是，十世纪的河西方言与今日的敦煌方言之间具有直接联系的证据没能见到。现代敦煌方言，则把贯穿南北的党河之东流行的方言称作“河东话”，把党河之西流行的方言称作“河西话”，这是基于清朝以后屯田移民的出身地不同而加以区分的。今天的敦煌方言，其音韵特征的主要特点与今日西北方言一般所能见到的音韵特征没有太大的差异。还蕴含着一种中原语音特性，这就意味着，罗常培的比较难以奏效，即当时西北方言的特性并不突出。

高田时雄思考唐五代汉藏对音译音方音性质的角度与罗常培有很大差异。高田时雄的分析更精密一些，被公认为现代学者研究唐五代西北方音继罗常培之后的“后出转精”之作。

高田时雄《语史》完成之后，一些学者对汉藏对音译音的研究继续进行，冈本勲《〈唐五代西北方音〉と日本汉字音》（《中京大学文学部纪要》22（2），1988）；《チベット資料による汉字音の音価推定——唐代の声母について》（《中京大学文学部纪要》22（3），1988年）、池田巧《汉藏对音资料 P·T·1238 所见的中古汉语河西方言韵尾的对音》（《中国语学》236 号，1989）、冈本勲《日本汉字音の比较音韵史的研究》（樱枫社，1991，东京）

其中，冈本勲（1991）力图强调藏语资料在日本汉字音研究的位置，以及藏中日比较音韵史的构想。认为藏语资料在记录中国“原音”音值上具有可信性，还有对研究日本汉字音的发挥重要作用。冈本勲的研究拓展了罗常培（1933 年）汉藏对音译音研究的应用领域，其意义当然不仅仅局限于对汉藏对音译音研究所具有的价值了。但这种研究还只是一种尝试。

除了唐五代汉藏对音译音资料研究之外，日本学者还有研究明清汉藏对音译音资料论著出现，比较重要的是西田龙雄《十六世紀にける西康省チベット語天全方言について——汉语・チベット語単語集いわゆる丙種本〈西番館譯語〉の研究》（《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紀要》第7号，1963）与《西番館譯語の研究》（松香堂，1970）、更科慎一《現代アムドチベット語によるく（乙種本）西番館雜字〉の朗讀に對する音聲的分析》（《山口大学文学會志》56，2006）等，也值得注意。

## 参考文献

高田时雄：《敦煌資料による中国語史の研究》，创文社，1988 年。

冈本勲：《日本汉字音の比较音韵史的研究》，樱枫社，1991 年。

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十二，1933 年。

（通信地址：361005 厦门 厦门大学中文系）

【本文责编 蓝庆元】